

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

(英) 亚历克·诺夫 著
唐雪蓁 叶南奇 周虹 译
王连生 李 黎 高 钰

· 当代经济比较研究丛书 ·

当代经济比较研究丛书

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

〔英〕亚历克·诺夫 著

唐雪葆 叶南奇

周虹 王连生 译

李黎 高钰

陈季东 校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季东

责任校对：刘进珍

封面设计：式 一

版式设计：王丹丹

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

Kexing de Shehuizhuyi Jingji

〔英〕亚历克·诺夫 著

唐雪葆 叶南奇

周 虹 王连生 译

李 黎 高 铨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875印张 271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册

ISBN 7-5004-0402-6/F 94 定价：3.40元

《当代经济比较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编：马 洪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宏昌 厉以宁 禾 村 吴敬琏

陈伯林 周叔莲 荣敬本 高鸿业

黄范章

出版说明

为了加强对当代外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了解，我们特编辑出版《当代经济比较研究丛书》。出版这套丛书，是着眼于这些著作在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或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可供借鉴或参考的地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改革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以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当然首先必须总结本国的经验，与此同时，还必须了解外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采取分析的态度，进行比较的研究，批判错误的东西，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走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企图借“国家干预”来支撑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并未能阻止现代资本主义的腐朽化进程，反而招致低增长率、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福利”危机等问题，从而深深陷入了困境而难以自拔。现代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决定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性。然而也要看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也在一定限度内，对于单个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某些经济过程，进行了比较认真的分析。这些研究往往同现代化大生产合理组织和管理有关，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同时，国外的学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其

主要任务是解决计划化与市场机制如何结合的问题，因而这个问题也就成了经济学家所注重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些经济学家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有的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问题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进行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工作，无疑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有些著作中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则必须对它们加以批判。

战后发展起来的所谓“发展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战略和各种经济发展问题。尽管其中不少著作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观点，但作者收集了大量资料，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的理论，因而也可供我们参考。

我们愿和广大读者一道，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开展对当代外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比较研究，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亚历克·诺夫为英国经济学家，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与苏联问题著称。本书的主旨为探求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读者可以看到，作者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从不同的理论基础来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而其最终结论——对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设想，却与我国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极为接近。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本书具有其独特的参考意义。书中个别议论有删节，但删节处极少（以删节号标出）；另外，删去了附录3。“关于乌托邦的札记”。

本书各部分的译者为：

中文版序言	唐雪葆
前言	王 丰 禾 东
绪论	唐雪葆
第一部分	唐雪葆
第二部分	叶南奇
第三部分	周 虹
第四部分	王连生 李 黎
第五部分	高 钰

全书由陈季东统一校订。

一个不讲正义和道德的社会显然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

V. 帕累托

我们已经遭受，并仍在遭受政治和社会的重症；与此同时，我们却经历了一度被认为可以消除苦难的无望的革命拯救，而终于渡了过来。这便是我们时代政治上的奇特事件。

阿尔文·W·古尔德纳

中文版序言

我的书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我十分高兴。此书写于1982年，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写作本书的目的是批判那些对马克思作出教条主义解释的观点；依我看来，这些作者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政策，并以虚幻的标准评价苏式经济的成就和问题。第二个目的是对集中计划体制进行批判性分析，从这种批判中引出一种替代模式，即我所谓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我对苏联、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经验的关注要远远多于中国；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中国的经验没有什么重要性，——贵国在最近几年所实行的重大改革进一步增强了这种重要性。我的问题是了解情况不多，我不懂你们的语言，对你们的历史和文化也知道甚少。不过，如果我对本书作出新的修订，我一定将更多的篇幅用于论述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许多改革措施同我在本书最后一章所描述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的图景是一致的。

对匈牙利还得再说几句。匈牙利经济目前处于严重的困境。这是否因为其改革模式存在缺陷或在应用此模式时半心半意及步调、措施不一致，以致既无有效的计划又缺乏对实际市场的约束？匈牙利是一个小国，缺乏大部分非农业原料，而主要的困难是缺少支付进口的外汇（但农业搞得较好）。对于产生问题的原因，必须进行仔细的研究。

南斯拉夫的经济则更为混乱，通货膨胀年率很快达到150%。这与自治却关系极小或完全无关，而和缺少有力的中央权威、六个共和国各行其是以及对投资或银行缺少控制很有关系。这也需要作深入的研究。

再说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所展开的改革过程。苏联的改革派经济学家正在对集中体制进行非常严厉的批评，说它已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阻碍创新，压抑管理人员的进取心，鼓励浪费，不能反映用户的偏好，造成短缺并因而导致腐败。农业尤其效率低下，浪费了大量投资。其实，苏联经济学家对本国体制的批评要甚于多数西方分析家！戈尔巴乔夫正确地坚持，彻底的改革势在必行，而且要与公开性的扩大及“民主化”联系起来，以便克服“1800万官僚大军”的阻力。改革方案包括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企业真正自主，更为灵活的新价格体系，用“生产资料的贸易”取代材料分配，可以选择供应商，从而形成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以及合法的生产合作社的竞争。在对外贸易上要有自由，甚至谈论使卢布成为可兑换货币的措施。但是，必须强调指出，这项宏伟改革方案的贯彻已碰到很大的困难，进展极其缓慢。因此，生产计划依旧通过所谓的“国家指令”下达，它覆盖了多数企业的大部分生产能力。价格改革在1990或1991年以前是不会进行的，价格改革的原则仍在争论之中。

与中国相比，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将依然存在，但在其内部却出现了承包小组，有些是家庭承包组，它们可以获得相当大的经营自主权。一项新的法律还使家庭租赁土地成为可能，不过这在实际中的重要性如何尚不清楚。与中国的另一对比是，苏联城镇小型私营企业管理法有很大的限制性，解释的宽容度非常狭小。苏联的评论家对未来的预测十分谨慎：在彻底改革者与保守派之间可能会有持久的斗争，有前进，也有后退。经营管理权的必要分散只有通过坚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所推行的改革才能实现，这虽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但也确实如此。最近，我在莫斯科访问时，发现我的苏联同事对中国改革的进步与问题表现得兴趣盎然。显而易见，任何一个国家，当其经济前途未可预见，而在改革中得利者与失利者并存、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并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的话，是不会把如此重大的变革

介绍进来的。在比较的基础上研究这种改革过程，是十分需要的。

最后一点想法是：在中国，加强市场作用的理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较低（有人谈到“过早地过分公有化”）。在苏联，市场型的分散化的需要被视为高水平发展的结果。所以必须问一下：集中计划在何种情况下才是必要而合理的？“斯大林式”集中体制的理论基础也许是与国防部门的优先权密切相关的。这就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在苏联当时的体制和战时经济之间进行比较时得出的看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战时实行物资配给与价格管制的中央计划。）因此，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很可能是推动改革进程的一个因素。让我们对此满怀希望吧。

亚历克·诺夫

前 言

“社会主义”一词，常常能使人们产生极大的热忱，引起辛辣的讥讽，或强烈的敌意。它是一条通向未来的公平社会的道路，或是通向农奴制度的悲剧性的畸变，成为一条无数百姓被一些充满了权力欲和富于鼓动性的知识分子吸引进去的死胡同。我自己的态度，将会在下文中显露出来。但是我首先要表明的是，我的目的不是为以上任何一种可能性充当吹鼓手。我的目的是探讨什么可能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一种在现在已经孕育的孩子的有生之年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我一直在研究并试图理解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生长在社会民主的环境里，作为一个曾被布尔什维克们逮捕过的孟什维克所生的儿子，我继承了一种或多或少地对苏联的现实持批判观点的态度。如果苏联的现实是社会主义，我倒情愿生活在不是社会主义的地方（幸运的是，我确实生活在别处！）。当然，苏联的制度不是因为“背叛”，或由于斯大林的个性这种偶然事件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我曾试图描述过苏联的制度发展起来的过程，并特别注意这种制度的经济方面。我倾听了各种比较苏联类型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性观点。显然，这两者之间有差别。但是仅仅注意到了这种差别，并因此而批评苏联的现实与马克思设想的不一致，或者确实与列宁设想的不一致，那是很不够的。假如这些设想本来就是不切实际，自相矛盾的怎么办？我们能够因为斯大林及他的继承者们没有完成本来在现实世界中就是做不到的事情而责备他们吗？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确实犯下的过火行为及罪孽能在某种程度上归罪于他们所

奉行的信条吗？（如果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抗议道，这些信条是人道主义的，指出马克思和列宁并没有料想到会出现专制社会或压迫群众的现象，那么，人们可以提醒他们在世界上其他信奉基督教义的国家里所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的受害者正是基督信徒！）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对于集中计划的职能逻辑如此容易地与中央集权的专制的做法相“吻合”这一事实感到震惊。

好吧，那么什么是其他选择呢？……是否有一种科学社会主义呢？这里说的“科学”，它的含义不是指能被“科学地”证明为历史的发展道路，也不是指一种可以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完善社会的蓝图。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是尽善尽美的，完全合乎理想的。这种科学的社会主义应是一种设想合理、有可能做到、既能避免专制、又能避免无法令人容忍的低效率的制度。

我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越来越感到厌恶，因为这些人轻率地把世上所有的罪恶都归罪于“资本主义”。他们闭口不谈苏联的经历，而用一种认为革命以后的世界任何经济问题都不再存在的幻想（或者是任何可能产生的问题都能被世界共同体的“联合生产者”妥善处理的幻想）来代替认真刻苦的思索。我对芝加哥学派也不抱多少好感。这些人的“自由企业”的信念看来几乎不受庞大的官僚公司的增长的影响，而且他们对当前问题提出的补救办法也多是使富人受益，而置失业于不顾。即便是密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也比那些充斥着专业刊物的有关抽象模式的作品要好，因为弗里德曼至少还可以提出一些可付诸于现实生活的建议（尽管我认为他的建议是错误的）。

没有料想到，我现在竟想引用一位美国神学家的话。这位神学家说：

我们至少应该来认识一下社会主义，而不应该让它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恐怖名词；我们至少应该向资本主义挑战，而不应该让它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至圣称呼；我们至少应该试探这两种主义的某种组合，使这种组合不会导致斯大林主义，

但也不会导致那种以多数人的希望，甚至是生命作为代价而换来少数人的惊人利润。*

是的，我知道利润率近年来在下降，但也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因为成功的企业家赚了大笔的钱而使穷人变穷。然而，我确实认为当代的财产分配令人憎恶，特别是因为这种财产分配在任何可被承认的意义上都反映不出它对人类福利真正有多少贡献。

于是，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是否可能设想出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有没有一种能够避免苏联模式及其他现有变种的弊病的社会主义？有没有一种能在合理的效率下运行，满足既作为消费者也作为生产者的公民们的需要的社会主义？由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可能不存在，因此任何现实地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都不得不要应付这些问题。世上会有矛盾，会有紧张，会有争论。如果人生来就有选择的自由，他们也同样有做出错误选择的自由。与别人的不同选择之间也必定有冲突。

本书的大纲如下：在讨论了为什么必须认真对待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目的之后，我将对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的想法进行批判性的回顾和总结。马克思的这些想法，在我看来，有很大的缺陷，并且容易使人误解。在这之后，我将对苏联及其他试图引进“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经历进行考察，以得出值得吸取的教训。我在此也将讨论其他学者已经总结出的教训及提出的选择。继此之后，将是有关过渡问题的讨论：怎样才能向能为人们接受的社会主义过渡，并在过渡中牢记可能会犯下的（或已经犯下的）各种各样的错误？最后，我试图勾划出一个经济体制的轮廓，这个经济体制将具有两个特点：它将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可行的，可能在一个合理的时间限度内实现。

所有这些，看上去可能都是过于雄心勃勃。我的一位德国同

* 罗伯特·M·布朗：《军备竞赛的神学意义》（发表日期不详，约1961年）。

事在听了讲完我的计划后笑着对我说：“你想做的原来是要用《社会论》来代替《资本论》。事实并非如此。除了我个人智力的各种局限之外，完成这样的任务将需要一部多卷头的巨著。这里我所试图做到的，只不过是提出一些可供进一步讨论的想法；这些想法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我希望读者们会认为这些想法不是夹生的，但我决不敢佯称这些想法是完美无缺的。

我要特别感谢W. 布鲁斯，A. 德森尼-格尤勒特，M. 埃耳曼，R. 塞卢基以及L. 西尔克，他们阅读了本书的好几个部分，并提出了批评意见。我还得到了下列人士的教益，或共同讨论：D. 马特科、V. 里奇特、L. 巴斯勒、R. 塔塔林、玛丽·拉维格尼、简·埃爾斯塔，他们是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和牛津召开的讨论会的参加人士，另外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匈牙利人士。我还要感谢我所在的格拉斯哥大学为我提供了很好的环境，给我研究和旅行的时间。最后，但仍然是满怀深情地，我要感谢伊丽莎白·亨塔为我做的工作——辨认我的字迹并打出文稿。但本书疏漏不当之处，都属于我自己。

关于注释的说明

本书注释皆放在每一部分的末尾。所引作品为外文者，都由本人译出（除非另有说明）。文章标题只给出与本书论题有关者，或需认记者。没有写出作者的全部书目，因为所引的有关重要参考著作很多，如果将有关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经济问题的著作都详细列出的话，恐怕要成为一厚册。

对前言的补充 1984年1月

出版者慨然应允让我说明一两件事。从一些评论来看，有关我意识形态立场的最重要的事，是那些误解。一些人把我放在比我本来立场要左得十分多的左边。我的目的不是要鼓吹社会主义，而宁可说是在“辩护”（advocate）这个词的本来意义

上，*象律师行事一样，为社会主义作辩护。这就是说，我为我的“当事人”作最好的辩护，而没有必要加进去我的全部观点。无论如何，说真的，如果对我的“当事人”的“案子”没有一点同情心的话，我当初是不会做这件事的。

有人指出，在我的论述中有一大缺口。题为“过渡”的第四部分，充满对极端政策的警告；这些足以反映我对温和、适中的喜爱。但是那样的话，那又怎能向第五部分的社会主义前进呢？缺口的确是大的。原因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架这座桥！

事实上许多国家出现“新右派”的复活；反社会主义者成了受欢迎的候选人。很明显，民主的社会主义只能在多数人都希望那样做的情况下才能孕育起来。但现在他们没有这个要求，即使是面临经济萧条和失业。因此看来，只有当现存秩序进一步全面崩溃的时候，才能使我们的同胞相信有必要接受某种根本不同的选择。这样一种全盘的崩溃，不是人们所衷心期望的。（我就宁愿在平静中渡过我的余年。把晚上的时间消磨在欣赏莫扎特的伟大歌剧上，我觉得会比讨论革命收获更多一些。）本书第五部分描绘出了我认为是可行的、可以接受得了的那种社会主义的轮廓。如果人们不想要它，那也不坏，很好。他们有权去喜欢“他们所了解的魔鬼”。一种更为紧迫的忧虑是一场核毁灭，但那是另一个问题。

还要补充几句话。一个波兰同事让我看了奥斯卡·兰格致海克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信中说，对于被中央计划局所固定的价格，他只能“用作为方法论上的设计”，而对于现实事务，他赞成“价格由市场过程来确定”。这样看来，我在第三部分中对他的观点的介绍做得不大准确。此外，布兰科·霍瓦特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学》也应加进有关的书目中去。

本书如果能出新版的话，我将扩充对中国所作的过于简略的

* 英文“advocate”一词，除原义“辩护”外，又可作“提倡”、“鼓吹”解。——译注

分析，把注意力集中于重要的农业改革（“家庭责任制”，有效地打破了集体农场的形式），工业计划工作改革所仍然面临的问题，以及对私人小企业更为宽容的态度。在苏联，随着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农业政策也跟着（或恰好同时）改变：自治的劳动小队终于在1983年3月得到它们的政治局的祝福；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正类似于中国的政策变化。但是，在工业的计划工作上，强调的仍然是纪律，关于比较根本性的计划工作改革的广泛讨论还一直没有结果。

本书已经把作者引入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面貌的讨论之中。大部分讨论都倾向于欢迎把一剂“现实主义”添加进对将来的想像之中。很好，这正是我曾经希望的。

▲ 诺夫